

零距离探寻一代学人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  
面对面感受文化大家雍容大度的学者风范

# 一位哲人的目光

## 任继愈谈话录

任继愈 著 陈志明 编



# 一位哲人的目光

## 任继愈谈话录

任继愈 著 陈志明 编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位哲人的目光 : 任继愈谈话录 / 任继愈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7-5108-4868-1

I . ①一… II . ①任… III . ①任继愈 (1916-2009)  
—访问记 IV . ①K825. 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08685号

## 一位哲人的目光 : 任继愈谈话录

---

作 者 任继愈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 行 电 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 子 信 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23.5  
字 数 38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4868-1  
定 价 48.00 元

---

# 创建人类更完美的文化体系

## (代序)

继愈二哥走了五个年头了，悲痛逐渐淡去，感觉我们似乎仍然平静地生活在一起，从未分离。心灵的对话突破了人天之隔，我们在共同观察着世界，感悟着身边发生的一切。

先公后私、先人后己是他的做人习惯。他原来设想等主编《中华大典》的任务完成后，花上一两年时间写一本二三十万字的小书，阐述自己对人生最简约的理解。不幸的是，他承担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就匆匆离去，未来得及把他想说的话说出来。

我怀念他，总想把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替他说说。否则，他的一些想法就此流失，将是社会的损失。但我做不到。二哥博闻强记，思想似大海，我难以望其际涯。更何况他研究的是哲学，我研究的是草地农业科学，两者相去甚远。但在日常生活中，从孩童到老年，我们常就共同的所见所闻，有所交流。这就是我们思想的“最大公约数”，我们“原生态”的“思想特区”。在这里，我们常有说不完的话，我的怀念就从这些对话开始。为了行文简便，我略去了我的话。

## 所谓第一名，仅仅“不是坏事”而已

20世纪40年代初，二哥从西南联大哲学系毕业，在四川南溪李庄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攻读研究生。我在江津的德感坝国立九中读初中。南溪和德感坝都在长江边上，相距不远。有一次他专程从李庄到江津来看我，在德感坝“鸡鸣早看天”的小店里，忍受着臭虫的叮咬，住了三天两夜。他看了我的日记，找我的老师和同学谈话，得知我是全班第一名（当时学校从不排名次，但发放某一社团给流亡学生赠送的助学物品，僧多粥少，只能发给班级第一名。我因获得赠品才知道我的名次）。他对我说：“你是全班第一，这不是坏事，但不能说明你就学得很好了。学无止境，人生是长跑，你才刚刚起步，要踏踏实实学习，养成读书习惯，把身体锻炼好。”从那以后，我牢牢记住，所谓第一名，仅仅“不是坏事”而已，并一直以学习和工作的实际质量来要求自己。

1995年，我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看我因之忙得团团转，送我一副对联：“涵养动中静，虚怀有若无。”这几个字是我晚年的定海神针，我顿时觉得思想澄清开阔起来，又不由得想起七十多年前“不是坏事”这句收敛含义的话。

这一点他自己做出了榜样。他说话从不滔滔不绝，北大哲学系主任王博说他说话有点木讷。这与他在课堂上流畅透彻的讲课相比判若两人。我深知，他敏思而饱学，远在常人之上。他说话有点木讷，不是思想迟缓，而是思维过快、过深，瞬间有好几个思维层次奔涌而出，他的脑子里要经过一番挑选才能说出口来。因此说话有时不够畅达，过分简略，点到即止，甚至有时令人觉得他有些矜持。这与他从不自诩的内敛性格有关。1944年母亲在西安病逝，我从重庆到西安奔丧，他也从昆明到西安探视父亲。我们同在一室、一个大床上，住了一个多月。有人向他约稿。他大概每周写一到两篇短文。我见他写一篇关于《红楼梦》的文章，篇幅较长，引用书中的大量诗词。他在稿纸上打个引号就往下写，从不迟疑，也不查书。我惊奇地问他：“你连这些东西都能背得？”他平淡地说：“不是背的，看书时印象深的就记住了。忘记的还是比记住的多。”

他沉潜治学，曾把自己的书房叫“潜斋”，后来“潜”成习惯，连“潜斋”

的名字也不要了。

## 政治家应是优秀思想的实践者

“文革”末期，我轻度中风，住在北大中关园二哥家中，前后三个多月，那也许是我们一生中谈话最多的时候。当然谈得最多的还是“文革”。“文革”中“四个伟大”，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口号很突出。其中三个“伟大”是既成事实，可以理解，但他对“伟大的导师”的提法深感忧虑。他说从西周《尚书》的“皇族有训”，到秦始皇的“以吏为师”，再到宋以后把儒家完成宗教化，一直到今天，是一脉相承的。他说，政治家应是优秀思想的实践者。后来有人恭维他为“大师”，他说现在中国没有大师，今后二三十年内出不了大师。于是他献身为后来人铺路的工作，整理古籍，守望着未来的新人。

他说社会如此无序，少数领头人固然难辞其咎，但更应该探索其深层根源。没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长久的思想积淀，不至于闹到这一步。他追本溯源，从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宋代把儒家彻底改造成了儒教，孔子的神坛越筑越高，把华夏文化引入歧途。这个深厚的思想基础，五四运动未能撼动，新社会也无力摆脱。他说：“记忆犹新的十年动乱期间的造神运动之所以得逞，千百万群众如醉如狂的心态，它的根源不是佛教，不是道教，而是中国儒教的幽灵在游荡，只不过它是以无神论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无神论的宗教一旦丧失理性，比有神论的宗教更加狂烈没有底线。他的这种积累多年的思想压力，“文革”以后终于喷薄而出。1978年科学大会以后，他首次提出儒教是宗教的学说，此后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对儒教的论证与挞伐中。从1978年到2009年去世，他连续发表了二十几篇论文。最初几乎是孤军奋战，以后逐渐得到社会的响应。我不知道身患绝症、已至耄耋之年的他是以怎样的苦心和坚韧支撑下来的，何况他还承担着主编《宗教词典》《中华大藏经》《中华大典》等典籍的重担。我只知道他每天早晨4点钟就起床伏案工作，力求把儒家与儒教剥离清晰，给大家看看儒教的真形，直到住进医院。

他对十年动乱有深刻的理解，他相信历史终究会回归正道。“文革”前半段

他在五七干校劳动，后因眼病回到北京。他在中关园的宿舍被分出大半，他就在书架的包围中蜗居静思。他说文化是最本质的东西，发乎中、形乎外，不管戴什么帽子，披什么外衣，明眼人一眼就看得明白。他是曾被毛主席称为“凤毛麟角”的人，“文革”中找他的人不少，他都称病不出。他叮咛我说，不管“文革”的势头多么强大，都是违反历史规律的，是一股逆流，不能掺和进去。斗人的人和被斗的人，都是时代的牺牲品，都是受害者，后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文革”的结局验证了他的话。

当时，不仅“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且“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思想，也成了解决问题的万灵药。他认为将斗争如此绝对化，违反了辩证法，将使社会充满仇恨而被撕裂——他尊重儒家人文关怀的普世价值并恪守不渝。台湾一学者主编的《国学基本教材》请他作序，他欣然命笔。北大筹办国学院，他积极参与。但他不认为源于小农经济的“农耕文明”能够适用于后工业化时代。他也不同意不同文化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来回搬家。他说，文化是在多种文明碰撞、融合中不断更新发展的，如果死抱住儒家为主要代表的农耕文明不放，看不见海洋文明、工商文明，将会走晚清末年“洋务运动”的老路，做“冬烘先生”。他认为新旧文化之间，是“方死方生，方生方死”的蜕变，所谓“横扫一切”，所谓“先破后立”，所谓“一刀两断”，只能是空想。

### 有了“道”世界就比较安全了

晚年他谈的最多的是《老子》。他说“诸子百家”，可归结为两大宗，即儒家和道家。儒家是为当权者培养人材的，后来儒家异化为儒教，流弊很大，流毒很深，其极端表现为“文革”。他认为《老子》是弱者求生存的“一部空前的哲学著作”。出于对社会的关怀，以及知识分子本身弱者的地位，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没有离开过《老子》，直到晚年还出了《老子绎读》这本极其简约的解读《老子》的书。因为“迄今为止，老子提出的为政不要过多地干扰，乱出点子，让农民自然生生发育，在稳定中进步，仍值得借鉴。”他说：“反映农民呼声最早、最系统的是《老子》。”儒家讲天、地、人“三才”，这还不够。老子讲天、地、人、

道“四大”。有了“道法自然”的“道”这个基本规律的管束，别老喊“人定胜天”，世界就比较安全了。

算来快一个世纪了，我与二哥继愈，两个耄耋老人间的对话——说是对话，不如说是他对我的嘱咐，经常在我耳边回响，是怀念也是慰藉。

任继周

2014年

作者：任继周（1924—），任继愈胞弟，我国现代草地农业科学奠基人之一，国家草地农业科学重点学科点学术带头人，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先后担任甘肃农业大学畜牧系、草原系主任，甘肃农业大学副校长，甘肃草原生态研究所创建人、第一任所长，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教授、名誉院长，第一至第三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成员、召集人，第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编者按：

本文曾以《任继愈：文革造神能够成功民众发狂因儒教作祟》为题，载于《人民网》。收入本书时作者略作了修改。

# 目 录

谈中国传统文化——儒教	/001
不研究神学，就写不好哲学史	/017
古代哲学与近现代哲学	/023
哲学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灵魂所系	/027
哲学并不是纯思维的东西	/030
世纪老人的话之一：关于个人认识	/042
世纪老人的话之二：关于爱情、婚姻和人生	/078
世纪老人的话之三：关于做学问	/097
中国新哲学体系要有自己的特色	/119
《中华大典》工程回眸	/123
重视智力资源的投入和开发	/127
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也是科学	/132

任继愈：个人成才离不开社会	/ 135
编纂《中华大典》是我们这一代的责任	/ 137
重“学史”才能强“立志”	/ 140
提高观念文化的素质	/ 143
图书馆是一个国家文化发展状况的镜子	/ 147
玄奘为什么不如慧能	/ 154
国学与一个人的道德底线	/ 163
修辞立其诚，无意著东风	/ 167
国学与 21 世纪：任继愈、汤一介、袁行霈、余敦康 谈话录	/ 174
继绝存真，传本扬学	/ 181
不敢从心所欲	/ 195
对话哲学家任继愈：穿越古今的旅行	/ 203
人生是一条河流	/ 214

一位哲人的目光  
任继愈谈话录



哲学救国七十年	/221
民间力量十七年推动盛世修典	/229
祖国的语文，为什么不学	/236
哲学家任继愈：用科举的方式改革中国教育	/242
一位中国历史文化学者的心愿	/251
传承发展优秀历史文化：任继愈、冯其庸、李学勤、 芦荻对话录	/256
图书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社会教育的重要机构	/271
哲学的推动力是怀疑而非信仰	/277
中国文化典籍的一次全面总结	/283
觉悟了的群体才能推动社会	/290
实说冯友兰	/294
做第一流的学者：与任继愈的对话	/300
把思想光芒留给未来：任继愈访谈追记	/304

## 附 编

用历史的观点研究宗教	/314
任继愈谈我国宗教学研究现状	/316
“人是最根本的”	/317
坚持不懈地宣传无神论	/320
白首之心：记任继愈先生	/322
一位哲人的目光	/326
任继愈：天风海浪自悠悠	/328
通脱之心论古今：任继愈谈老子和道教	/334
任继愈：唤醒传统文化的衔接	/336
国力强盛，文化才能被世界重视	/338
任继愈：一部大书与一座图书馆	/340
任继愈先生漫谈录	/347

## 附 录

任继愈年表简编	/353
任继愈著作简表	/356



## 谈中国传统文化——儒教

访问者：胡孚琛

欣逢母校十年诞辰，我受学报编辑部之托，走访了十年来一直在母校担任研究生导师的任继愈教授。任先生让我向全院师生转达他对建院十周年的热烈祝贺，并高兴地回答了我提出的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问题。下面是这次答问的笔录，已请任先生审定。

### 中国的国情和传统文化

众所周知，中国的传统文化基本上是以儒教文化为主干，以佛教和道教文化为补充的民族文化体系。任继愈先生对中国佛教、儒教和道教文化都有精湛的研究，学术造诣很深。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反对把一些实际上是封建主义的文化当成社会主义文化的做法，这和青年一代为推进改革而要求树立现代社会观念的思想是相通的。在这次谈话中，任先生首先就中国的历史和国情谈起了他的一些看法。

胡孚琛：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对传统文化和中国现代化的关系越来越关心。请您谈一谈，传统文化的形成同我们民族的历史有哪些本质的联系？

任继愈：要认识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还须从中国的国情谈起。我国从秦汉到清末，基本国情是政治上愈来愈要求统一，经济上却保持着自然经济，

也就是说，个体的小农经济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这种个体小农经济的本性是分散的。一方面是政治上的高度统一，一方面是经济上的极端分散，这一对矛盾统一在封建社会的国家结构之中，其中哪个矛盾过了头，社会系统就出现震荡。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就是在不断协调政治和经济的矛盾中走过来的。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国家不统一，社会不稳定，在我们的民族心理上都认为是不正常的。反之，我国历史上的所谓太平盛世，国家都是统一的。我们的民族一直保持着这种“大一统”的观念。

胡孚琛：春秋时期，国人敢于对周厉王提出批评并赶走他。《周礼·小司徒》讲的“凡国之大事，致民；大故，致余子”，好像是召开国人会议的记载。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类似古希腊城邦民主制的现象吗？

任继愈：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不是民主制，而是君权专制、封建宗法制。这种宗法制脱胎于初民的氏族社会，是以家族、血统为纽带结合起来的政治体制。中国的封建宗法制政体能保持政治上的高度统一和长期稳固，主要是靠完善君权专制。我国的君权专制政体，有一个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秦汉时君主的权力日益加大，但汉初还不行，发生“七国之乱”就说明地方上还不统一。削平“七国之乱”后，“大一统”的思想在汉武帝时确立起来。唐朝设立六部，皇帝的权力更大了，六部尚书就是从唐朝时才开始有的。宋朝形成君主绝对专制的政治结构，国家的人权、财权、地方官吏任命权等，都集中在皇帝一个人手里。明朝从胡惟庸案件之后，不立宰相而设内阁，相当于皇帝的秘书班子，军国大事全由皇帝下命令。清朝设军机处，权力更加集中。唐朝的军队有太监监军，明朝太监的权力也大得很。这些太监有什么本事？无非是代表皇帝嘛！北宋时辽国打进来，地方挡不住，没有军队，等着皇帝调兵。那时元帅出征，还带着阵图去摆个什么阵，说明中央有个指挥系统。南宋时岳飞、韩世忠等人抗金，那是由于“二帝蒙尘”，国家机构乱了套，中央管不了啦，只好各自为战，打得反倒好了。历史上君权越来越加强、皇帝地位越来越高的事实，还可以从君臣之礼上看出来。唐朝的宰相上朝时是坐着的，到宋朝变成站着，而明清的大臣就得跪着奏事了。明朝还有廷杖，大臣触怒了皇帝，当场就打屁股。总之，从政治体制上说，主要是以逐步加强君权的办法来维系封建宗法制度。



胡孚琛：经济体制上呢？分散的小农经济和“大一统”的政治体制怎样协调？

任继愈：政治上的大一统，经济上的分散，这是中国的国情，两千年来基本没什么变化。秦汉唐宋时代的事我们是从史书里知道的，就我们亲耳听到亲眼见到的现代历史来说，为什么中国革命走了以农村包围城市这样一条路呢？这也是利用了中国社会在经济上分散的特点。利用中国社会结构的这个特点来发展革命力量，红色政权才能存在，才能星火燎原。恐怕封建社会历次农民起义在下层爆发，也不是偶然的，也是这种国情的产物；他们都是从君权专制统治的薄弱环节突破的。中国几千年来的国情就是这个样子。其实，分散的小农经济体制，也正是产生封建宗法制的经济基础。

胡孚琛：这种封建宗法制，就是平常人们说的家长制吧？

任继愈：分散的小农经济总需要有个家长来管理。个体农业以一家一户为单位，没有家长怎么行？农民都习惯于听家长的话，听父母的话；各级地方官吏就是父母官，也是家长。从全国来说，皇帝是君父，是一个总的家长。要巩固封建宗法制度，必然要在政治上加强家长制的君权统治，并使之同分散的小农个体经济和一定的意识形态协调起来，使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融合成一个总的体系。中国这么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大国，没有一种被神圣化了的统一的意识形态，怎么维护君主集权？中国的传统文化，就起着协调“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和分散的小农经济的作用。这个文化体系既包括哲学，也包括宗教等。由于只有读书人才懂哲学，所以为“大一统”的封建宗法制度作论证的哲学，仅能影响贵族、士大夫阶级。这就是说，哲学仅能控制知识分子，因为中国古代的广大劳动人民都是不识字的。《四书集注》无论注得多么好，渔人、樵夫、农民也看不懂。君主专制政权要在思想上控制处于蒙昧状态的广大劳动人民，就只能靠宗教。因此，在传统文化中，宗教占有重要的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也包含着一个逐步宗教化的过程。中国的哲学史和宗教史是密不可分的。我国传统文化的这一特点，也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中国两千多年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传统文化，实质上是一种维护君权专制、维护宗法制政治的封建文化。

## 儒教的形成和三教合流

任继愈先生是我国最早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宗教性，并对儒教的形成、特点和危害给以明确阐述的学者。他的观点，在《论儒教的形成》一文（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中已作了系统论述。笔者这次采访，又详细地询问了他。

胡孚琛：解放后我们在政治上对宗教采取过一些“左”的政策，要人为地取消宗教；学术界对宗教学的研究也较少，不少人缺少应有的宗教知识。因此，现在不少人对儒家文化后来演变为儒教这一观点，在感情上仍接受不了，总把宗教想象成一种离自己很遥远而又很可怕的东西，以为没有落发当和尚的人就与宗教无关，也有人仅把烧香、祭神等迷信活动看成宗教的特征，或把基督教当成判定其他宗教的唯一标准，因而对儒教的宗教本质还认识不清。先生能否把这个问题再具体地谈一谈？

任继愈：我总的意思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同世界文化有同步的一面。在封建社会里，无论东西方，在经济上都是靠天吃饭，精神上也不能不靠天，即受神的统治，无论是哲学还是科学都是宗教神学的忠顺的婢女。凡是封建社会，宗教都要起重大的作用。世界三大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都是在封建社会发展壮大起来的，这说明封建社会需要宗教。

胡孚琛：您的观点是不是这样：儒家文化一开始是哲学或伦理学，到汉代开始带有宗教性，初步形成儒教，宋明理学标志着儒教的完成；传统文化中儒教是主干，其他宗教信仰只是起配合作用的？

任继愈：孔子的儒家学说本来就是从殷周时天命神学和祖先崇拜的宗教思想发展来的，它的核心是强调尊尊、亲亲，维护君权和封建宗法制。然而我们说孔孟还是哲学家或政治伦理学家，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而不是宗教领袖。到汉代，儒教开始形成，并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汉武帝以后它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不过董仲舒时还简单些，那时只有道术，没有佛教，董仲舒就把方仙道里的法术吸收进儒教里来。他能登坛求雨、止雨，孔子的时候哪有这一套！



汉儒讲天人感应，也是宗教思想。汉朝的宰相就有燮理阴阳的职责；如果阴阳不调，就是宰相没有尽职。那时有丞相丙吉问牛喘的事，因为不到节令而牛喘，表示阴阳不调，但是他对打群架的，死伤在路的，不加过问，认为是小事。这都是汉儒宗教思想的反映。宋明理学形成后的儒，和汉儒又不同了，和孔孟更不一样。宋儒讲修身啊，养性啊，这都是宗教里的东西，孔子哪讲什么心性之学！“存天理，灭人欲”，这种禁欲主义也是从佛教和道教里吸收来的，宗教讲欲是万恶之源嘛！伪《尚书》里讲“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段话从秦汉到隋唐没看得那么重要，可是到了朱熹那里，就不得了啦！说这是尧舜以来的“十六字真传”，是世代传法的道统。儒教完全形成后，孔子的地位就越来越高，高到皇帝头上去。中国的皇帝对谁也不磕头，只在祭天、祭孔、祭祖时磕头，这说明孔子已取得宗教里神的地位，因为只有神才是在帝王之上的。中国是个多民族、多信仰的国家，信天、信祖、信圣人、信佛、信仙，但都离不开儒教中三纲五常这类封建宗法伦理规范的大框框。

胡孚琛：儒教里的三纲，显然是封建宗法制的核心，后来被抽象为“忠”和“孝”，这也是宗教性的东西吗？儒教和世界三大宗教的宗教特征总有些不同，例如它不像佛教那样注重追求彼岸世界和个人心灵的解脱，而是把重心放在宗教的社会功能上，即着重于宗教在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方面的教化作用……

任继愈：这正是儒教成功的地方。它是一种不具宗教之名而有宗教之实的特殊宗教，有时甚至还打出反对宗教的幌子。封建宗法社会的伦理道德，即忠和孝，是儒教的核心。凡是宗教都对理性有个限制，对宗教的核心问题是不允许怀疑的。对西方的基督教徒，你就不能问他上帝为什么存在。他认为上帝本来就存在的嘛，这还用问！在儒教里，你也不能问为什么要孝敬父母，为什么要忠君，天、君、圣人为什么尊贵，因为这些都是不允许怀疑的事。你读过王阳明的《传习录》吗？王守仁充军到贵州，生活那么困难，万念俱灰，什么都不想了，就是忘不了他的祖母，这一念怎么也放不下。他做到万念俱空，但如果连这一念也空，就等于禽兽了。儒教的要害就在这个地方。要害之处不准怀疑，不准追问个为什么，这恰是宗教的特点。哲学就不同，可以追问到底。思辨是没有禁区的，凡对人的理性搞禁区，多是宗教性的反映。有神论者反对无神论者，觉得一个人没有信仰是不可思议的事。